·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产业体系难题的解答及其世界历史意义

刘新刚,李倩玉

(北京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现代产业体系的有效形成与协调运转,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回应的关键难题。西方主流经济理论通常从市场主体、价格信号和均衡机制解释产业联系,并倾向于把各部门的孤立发展及其市场交换视为产业体系形成的基本机制。但现实运行表明,产业部门的孤立发展并不必然转化为体系的整体协同。在当代,这一难题集中表现为金融、科技、数字等支撑性力量不断扩张,却未能形成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先进制造业长期能力积累的稳定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形成了科学认识和处理产业关系的发展理念;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形成了统筹产业整体发展与保障长期积累的制度能力;在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中形成了推动现代产业体系持续调整、不断完善的内生机制。这一解答深化了人类对产业部门由分化走向协同规律的认识,拓展了产业体系协同建构的路径,为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推进现代化创造了新的现实可能,对推进人类现代化历史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人类现代化进程;现代产业体系难题;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971(2026)05-0001-11

DOI:10.16822/j.cnki.hitskb.2026.05.001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围绕“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部署,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置于重要位置,强调在复杂多变的发展环境下,我国“完整产业体系优势”更加彰显,同时要求“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1]。这一部署表明,现代产业体系既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也是应对国际竞争、增强发展韧性和赢得战略主动的深层支点。然而,产业门类增加、产业规模扩大和产业结构升级,并不等于现代产业体系已经形成。现代化一方面通过工业化、科技革命和市场扩展不断细化社会分工,使金融、科技、数字等支撑性部门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各部门在相对独立的发展中又会形成不同的收益方式、评价标准和运行周期。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由此面临一个根本难题:如何把按照不同逻辑运行的产业部门组织为相互支撑、连续循环并能够持续生成现实生产能力的有机体系。

围绕这一难题,既有研究从产业结构升级、产业政策有效性、金融脱实向虚、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揭示了现代产业体系运行中的一系列重要矛盾。但这些研究大多聚焦某一产业部门或某一资源配置环节,较少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再生产的总体联系出发,考察金融、科技、数字等支撑性力量为何会反复出现与实体生产非同步等现象。现代产业体系难题的核心,是社会分工推动产业部门不断分化以后,各部门的分别发展难以自发转化为体系的

收稿日期:2026-04-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原创贡献研究”(21&ZD018)

作者简介:刘新刚(1978—),男,山东文登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李倩玉(1996—),女,河南南阳人,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整体协同。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往往从抽象市场主体、价格信号和局部均衡出发,把各部门按照市场规律分别发展视为产业体系自然形成的充分条件,却难以揭示不同产业的社会属性和体系功能,也难以说明市场交换、资本增殖与社会再生产总体要求之间的内在张力。中国式现代化对这一难题的解答,既在于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产业体系的总体性本质,也在于通过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把科学认识转化为组织产业实践的现实能力,并在实践检验和理论创新的循环中不断完善现代产业体系。

一、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产业体系难题

人类现代化进程并不是一个单纯由技术突破推动的线性演进过程,而是在产业分工持续深化、产业结构不断重组、市场体系逐步扩展和支撑性部门不断发育中展开的历史过程。也正因如此,现代产业体系所面临的突出矛盾,随着现代化不断向纵深推进而发生历史性转换。

近代以前,社会生产总体上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产业分工范围有限,生产和交换更多受制于地域、交通和传统技术条件。霍布斯鲍姆以“双元革命”[2]序言概括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共同开启的世界历史转折。机器大工业突破了家庭和工场内部的局部分工,把原料、设备、能源、交通、劳动力和市场纳入更加广泛的社会化生产过程,人类由此开始形成区别于传统产业并列状态的现代产业体系。在工业化初期,产业体系面临的首要难题是生产能力及其支撑条件不足。亚当·斯密指出,原生产物和制造品必须在不同地区之间流转,“假设没有资本投在运输业中,这种运输便不可能”[3]337。运输、商业、信用和结算环节的发育,首先是现实生产扩张所提出的客观要求。制造业的发展同时推动科学知识、机器制造、能源供给和专业服务成长。机器生产越复杂,单个企业越不能在自身内部生产全部条件,煤炭、钢铁、机械、运输和金融便在相互需求中扩展。马克思指出,一个产业部门生产力的提高往往依赖另一个产业部门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家利用的,是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4]96。现代产业体系最初不是由理论预先设计出来的,而是在机器大工业扩大社会分工、不同部门相互提供生产条件的实践中逐步形成。

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这一历史阶段形成了与工业化扩张相适应的产业理论。在《国富论》中,斯密从劳动分工出发,以交换倾向和个人利益说明分工与交换得以展开的行为动力,并以市场范围解释分工深化的现实条件,揭示了专业化和市场扩展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作用。金融、运输和商业总体上仍围绕工业扩张运行,部门利益与扩大现实生产之间尚存在较强的一致性,因而以市场交换解释产业联系具有一定历史合理性。此时尚未充分暴露的问题,是当专业职能真正独立为产业并形成自身利益结构以后,交换关系能否继续保证产业体系的整体协调。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由此容易把工业化早期部门利益与现实生产扩张之间的历史性一致,提升为市场机制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实现产业协调的一般规律。马克思批评政治经济学“满足于照搬工商业生活上的术语”,因而把“自身局限于这些术语所表达的观念的狭小范围”,但“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作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作是永恒的、最终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5]33。这一批评同样适用于产业理论,若把特定阶段上金融、商业服务工业扩张的经验抽象为永恒规律,就会遮蔽支撑性职能取得独立增殖条件以后,产业关系可能发生的性质变化。因此,早期现代产业体系的问题主要是“能否形成足够的生产和支撑能力”。

19世纪后期以来,工业化由机器应用和生产规模扩张进一步转向资本组织、科学研究和专业服务的制度化发展。职能独立化提高了专业效率,但也使支撑性活动获得了独立的利益主体、收益方式和评价尺度。马歇尔关于工业区、外部经济和知识扩散的分析,已经注意到企业生产力不仅来自“这工业的个别企业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的经济”,也来自专业化供应商、熟练劳动市场和产业集聚形成的外部条件,即“有赖于工业的一般发达的经济”[6]315。这一认识向产业体系观迈进了一步,但新古典主义理论仍主要把产业联系归结为价格、成本、供求和企业选择的相互作用。随着一般均衡和边际分析成为主流,产业部门通常被作为可以比较和替代的资源配置领域,产业体系则容易被理解为经过市场竞争汇合而成的均衡结构。希法亭指出,股份资本的发展使“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和(虚拟的)股份资本之间的差别可能进一步扩大”[7]116。马克思则在分析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信用制度和虚拟资本时指出,在金融中心,“一切都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4]555。现实生产的周期漫长并受物质条件制约,金融资产却可以通过交易、估值和杠杆不断缩短收益实现时间。金融越是能够在自身循环中实现增殖,就越不必然把资源稳定投入制造业的设备更新、工艺积累和关键技术攻关。科技领域也在专业化过程中形成知识生产与产业能力生成的差异,论文、专利和项目能够确认知识成果,却并不能自动完成中试验证、工程放大、工艺定型和规模应用。马克思揭示,自然力和科学只有物化为机器、设备和社会劳动组织,成为“人的手的创造物”[5]444,才进入现实生产力。知识生产制度越完整,越需要专门机制把知识重新嵌入产业过程,否则科研繁荣与制造能力之间就可能出现结构性断点。

由此,现代产业体系难题的重心开始由生产能力及其支撑条件不足转向产业部门分别发展与体系整体协同不足之间的矛盾,各产业部门虽然持续扩张,其发展方向却未必符合社会再生产的总体要求。支撑性部门越专业化、制度化,其自身评价和收益逻辑越可能与制造业长期能力积累相分离。因此,真正的难题在于,支撑性部门取得相对独立地位以后,其专业化发展难以自发重新嵌入社会再生产总体,部门专业效率与产业体系整体效率因而可能发生分离。金融、科研和数字活动只有保持相对独立,才能形成专业知识和规模能力,但如果缺乏把专业能力重新导向社会生产总体的制度机制,相对独立则转化为相对封闭,专业效率可能以体系效率下降为代价。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理论任务,正是寻找能够在更高分工水平上重新组织总体联系的社会形式。

市场自发调节无法消除产业体系矛盾,资本主义现代化由此不断寻求新的解答。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危机表明,个体企业依据价格和利润作出的分散决策,可能汇聚成有效需求不足、投资萎缩和大规模失业的局面。凯恩斯以总量分析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并不会自动实现充分就业,甚至可能会带来“劳动者的就业不足”[8]303。因此他主张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稳定投资与需求。这一转向突破市场自动均衡教条,使国家调节成为西方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后发工业化和战后重建中,发展经济学更直接地认识到产业间存在互补关系和协调成本。此外,赫希曼从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出发,强调有选择的不平衡增长可以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李斯特从国家生产力出发,主张后发国家不能简单服从当时国际比较优势,而要通过保护和培育制造业形成独立生产能力。这些理论均在不同程度上承认,产业体系不是市场交易的自然副产品,而需要国家战略、公共投资和产业组织。这些解答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西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扩张和技术进步,也为若干后发国家工业化提供了政策资源。但其理论重心大多仍是纠正“市场失灵”、扩大有效需求或选择增长部门,尚未充分追问市场失灵因何会随资本积累反复生成,更未改变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条件下产业主体围绕资本增殖展开活动的基本关系。

进入当代,金融、科技和数字等支撑性力量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现代产业体系难题也由局部协调困难演变为多重支撑力量与现实生产能力之间的系统性非同步。产业体系表面上更加丰富,资本、技术和数据流动更加迅速,但部门扩张越快,越需要回答这些力量能否真正形成先进制造业和实体经济长期积累的稳定供给。金融化、科研评价化和数字平台化,使支撑性部门日益形成相对独立的内部循环。短期回报导向使金融资源更多流向房地产、资产交易和金融内部循环,制造业所需的耐心资本相对不足;项目、论文、专利和奖项可能替代成果产业化,工程化和中试环节薄弱使知识难以转化为设备、工艺和产业组织;科技部门越繁荣,知识到生产力之间的中间环节越需要被有意识地建设。数字平台化则把这一矛盾推进到新的阶段,数字技术具有低复制成本、网络效应和规模报酬递增等特征,更易与金融资本和平台估值结合。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金融、科技和数字并非分别偏离,而可能相互强化。金融资本追逐易估值的科技概念和平台企业,科研活动围绕资本市场偏好的技术赛道配置,数字平台又凭借数据和网络优势吸引更多资本。这种循环能够产生新的产业和财富形态,却未必将优质金融资源、前沿技术成果和高价值数据资源配置到先进制造业最需的工程化和能力建设环节。现代产业体系由此可能出现“支撑力量很强、实体承载不足”的情况。这种叠加还表明,现代产业体系难题已经从部门比例失衡深化为“能力生成链条”断裂。金融资产、科研成果和平台数据都可以成为对未来收益的权利凭证或符号形式,但权利凭证的增加不等于未来生产能力已经形成。只有当资本进入设备和工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程体系、知识转化为工艺和产品、数据沉淀为工业模型和组织能力时，未来收益的预期才能获得现实基础。

由此，现代产业体系难题的历史生成可概括为一条连续链条：机器大工业扩大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催生专业化支撑部门，支撑部门取得独立利益和价值实现形式，资本增殖推动其沿自身最有利的通道扩张。与此同时，以抽象市场主体、价格信号和局部均衡为起点的理论预设，将各产业部门分别发展等同于产业体系自然形成，遮蔽部门自身合理性与社会再生产整体要求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也使支撑性力量偏离实体生产问题易被理解为暂时性配置失衡。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虽不断尝试纠偏，却受制于既有理论视野和生产关系，未能持续把支撑性部门扩张纳入社会再生产总体，最终形成支撑力量增长与实体能力积累非同步的体系矛盾。现代化推动产业职能持续分化，形成具有不同利益结构、运行逻辑和时间尺度的产业部门，但各部门的分别发展难以自发转化为围绕社会再生产形成的整体协同，由此产生产业分化不断深化与产业体系整体形成之间的矛盾。

二、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产业体系难题的解答

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产业体系难题的解答不是在既有西方产业理论框架内增加若干政策工具，而是把对难题成因的科学分析同对难题的系统解答统一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中。现代产业体系难题的实质，在于产业职能持续分化以后，各产业部门的分别发展难以自发转化为围绕社会再生产形成的整体协同。这一矛盾涉及产业主体的社会属性、市场交换与社会再生产的关系，以及支撑性部门价值实现方式等深层问题。因而，在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解答之前，有必要首先分析这一难题何以产生、依何种机制展开，进而从其内在根源中引出相应解答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产业体系难题的科学解答，建立在对其生成根源和运行机制的正确认识之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9]，还强调“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10]。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从现实社会关系出发，由个别产业现象进入社会再生产总体，既考察不同产业主体如何进行自身活动，也进一步分析其局部运动能否转化为社会生产的整体能力。由此，对现代产业体系难题的理解才能从金融、科技、数字等部门的表层偏差，深入到产业主体分散运行与社会再生产整体要求间的内在矛盾。

第一，理性人假设遮蔽了不同产业的社会属性和功能差异。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501。金融机构、科研组织、数字平台和制造企业虽都可能以法人和市场主体形式出现，却处于不同生产关系和功能位置。金融进行货币资本跨期配置，科研生产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数字平台依赖网络效应和数据集中，制造业则通过复杂劳动、机器设备和工艺协作把各要素转化为物质产品。将各类主体抽象为收益最大化者，只能解释其逐利行为，无法说明其如何服务产业体系整体。不同产业的社会属性，又决定其时间、风险与价值实现结构各异。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需长期固定资本、连续工艺积累和稳定供应链；金融资产借助交易快速退出；科研成果通过发表和确权实现制度确认；数字平台依靠用户规模和资本估值形成收益。若仅以统一利润信号和市场选择衡量这些活动，对社会生产具有基础意义但回报周期长和外溢性强的能力建设会被低估。在现实中，产业的社会属性取决于其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位置及部门关系。金融既可集中资金支持长期投资，也可能转化为资产逐利的工具。科研既可经工程化转化为生产力，也可能困于内部评价循环。数字平台既可降低协作成本，也可能凭借数据垄断攫取产业收益。正因为产业功能具有关系性和可塑性，解答难题不能抽象地赞成或限制某一产业，而要重构决定其行为方向的制度关系。

第二，市场均衡的理论预设把社会再生产总体协调寄托于分散主体的自发行动。抽象理性人假设将不同社会属性和体系功能的产业部门还原为一般市场主体，市场均衡理论进而认为，各主体依据价格信号理性选择并通过交换实现价值，分散活动便能够汇合为社会生产的总体协调。然而，个别商品的价值实现与社会生产条件的总体再生产并不是同一过程。商品交换所实现的，主要是不同所有者间的价值转化和使用价值转移。社会再生产所要求的，则是上一轮生产中消耗的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生产资料、劳动力及其他生产条件能够在不同部门之间得到连续补偿、更新和积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分析表明,社会生产的连续进行不仅要求价值实现,还要求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按一定比例完成物质替换。资产可出售、技术可交易、平台可盈利,并不意味着再生产所需的设备、工艺、人才和基础设施已经形成。价格机制虽能事后调节供求,却难以反映基础研究、战略备份和技能培养等长期社会价值。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会不断发生巨大的紊乱”[12]349。把产业体系完全交给事后价格校正,就意味着只有在产能丧失、技术受制或危机爆发以后,社会才以巨大成本重新认识长期能力的价值。社会再生产的总体性还意味着,产业协调不能只在同一时点上考察。当下看似低效的基础研究、备用产能和产业基础能力,可能是未来生产连续性的前提。高利润的资产交易和平台扩张,则可能透支制造能力和长期创新。因此,现代产业体系难题不仅在于市场调节的事后性,还在于分散主体难以承担社会再生产总体协调和长期能力建设责任,需要形成代表整体利益、统筹当前与长远并将长期产业价值转化为现实资源配置的组织主体和制度机制。

第三,资本增殖逻辑进一步使支撑性职能的独立转化为价值实现方式的相对独立,由此加深现实运行中部门自身发展与社会再生产总体要求之间的分离。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分析揭示,商品形式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为“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5]89。他进一步指出,在这种条件下,“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5]90。进入现代产业体系,资本估值、论文专利、平台流量等可计量形式也易遮蔽其背后的社会关系。金融资产看起来能够自行增殖,知识成果看起来能够独立完成价值,数据规模看起来天然等于生产力,支撑性活动同现实生产的功能关系由此退居幕后。当金融交易、知识确权和平台垄断收益高于制造投资时,资本便会按增值逻辑重组产业资源。信用和股份制度虽能集中资本、支持大生产,但也会使资本所有权与现实职能分离,推动虚拟资本独立运动。科技和数字领域同资本结合后,也可能围绕可资本化成果和垄断收益运行。因此,破解这一难题必须深入其价值实现方式、利益机制和评价标准,以实体经济能力和社会再生产连续性检验其发展成效,通过政策与实践调整,使资本收益、科技成果和数字价值实现同先进制造业能力积累相统一。

上述分析表明,现代产业体系难题具有相互贯通、层层深化的三重根源。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完成了对现代产业体系难题的科学解答:

第一,基于正确理论起点,从社会再生产总体联系和产业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形成科学认识和处理产业关系的基本理念与实践原则。抽象理性人假设之所以难以正确认识现代产业体系,根本原因在于它从脱离具体社会关系的孤立个人出发,把不同产业主体都还原为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的一般市场主体。正是在这种抽象化理解中,现代产业体系被从社会再生产的总体联系中剥离出来。因此,破解现代产业体系难题,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把握现代产业体系整体性本质,确立衡量产业发展成效的根本尺度,明确立足具体历史条件推进产业演进的实践原则。

一是,以系统观念把握现代产业体系的整体性本质,是纠正抽象化理解的根本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系统思维”,“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13]。将这一方法论要求落实到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上,意味着不能把现代产业发展理解为金融做大、科技活跃、数字扩张、制造升级等若干目标的并列推进,而必须把它理解为一个以现实生产能力为基础、以产业分工联系为纽带、以连续再生产为条件的有机整体。在这一整体中,各类支撑性力量的意义取决于它们能否进入并稳定支撑实体经济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的能力形成过程。换言之,现代产业体系发展不在于支撑部门越多越好、结构名目越新越好,而在于这些因素是否在整体上提升了社会生产体系组织能力、供给能力和再生产能力。

二是,以实体经济和先进制造业能力积累为衡量尺度,重新界定支撑性部门的发展成效,是推动其回归产业体系支撑功能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关系我们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14]这一论断明确了现代产业体系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的根本判断标准。现代产业体系之所以成立，在于这些支撑力量是否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能力、制造能力和产业链组织能力。金融沉溺于短期套利、资产交易和流动性循环，难以稳定支持制造业长期资本形成。科技停留于项目申报、成果认定和指标竞争，难以转化为工程化、中试化和产业化能力。数字受流量、平台和估值逻辑支配，也难以真正嵌入生产流程、质量控制和供应链协同。由此可见，把实体经济和先进制造业重新确立为现代产业发展的衡量尺度，实质上是把各类支撑性力量重新纳入现实生产和长期积累的评判框架之中，纠正以部门自身规模扩张和收益增长评价其发展成效的片面认识。

三是，坚持从实际出发、把握产业演进的具体历史条件，是防止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滑向抽象先验设计的重要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而是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15]。中国式现代化是从现实生产过程、现实产业基础和现实能力生成条件出发理解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其理论要义在于，产业发展不是若干先进部门简单叠加，也不是新旧产业机械替换，而是现实生产力诸要素在既定历史基础上不断重组、提升和展开的过程。正如《资本论》所揭示的，社会生产从来不是孤立部门的拼接，而是一个由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各环节相互制约构成的总体过程。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产业体系的理解，是将其放回社会再生产的总体联系中加以把握。只有坚持这一实践立场，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才不会滑向追逐概念风口、脱离产业基础和忽视历史阶段的冲动，现代产业体系的协同难题，也才能在理论起点上被真正识别和解决。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将分散的产业活动纳入社会再生产总体，形成统筹产业整体发展与保障长期能力积累的制度能力。现代产业体系是一个多主体、多部门、多层级和多重利益关系交织作用的复杂系统。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就在于通过党的全面领导和制度性安排，把理论上正确的方向转化为现实中的治理能力，使支撑性力量真正回到服务实体经济和先进制造业的总体要求之中。

一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纳入国家现代化全局统筹推进，是支撑性力量回归实体经济的根本政治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16]。这一论断从政治组织结构上回答了谁来统筹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方向问题。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之所以不能放任部门分治、市场自流，原因是其本质上涉及发展和安全、当前和长远、效率和公平、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等多重关系的协调。若缺乏更高层级的统一领导，支撑性力量极易围绕局部利益和短期收益展开竞争性扩张，从而不断偏离国家现代化建设所要求的实体经济根基、制造强国方向和产业安全底线。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实质上就是通过国家意志、战略目标和整体视野，把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从“分散博弈的结果”转变为“有方向组织的过程”。这并不是外在地限制市场和技术，而是为市场配置和技术创新提供一个不被短期逻辑和局部利益不断扭曲的总体方向框架。

二是，把现代产业发展的方向要求转化为重大决策和资源配置中的刚性制度要求，是治理方式真正发挥作用的核心环节。理论判断之所以常常在现实中失效，关键在于它没有被转化为可贯彻执行的制度标准。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也是如此，若“服务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等要求只停留在原则口号层面，就难以真正穿透投资决策、项目评审、财政资金投向、金融供给安排、园区平台建设和产业链布局过程。必须把“是否有利于提高制造能力”“是否有利于关键环节自主可控”“是否有利于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升”“是否有利于形成长期能力积累”嵌入产业政策、科技政策、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和区域政策等各类制度安排中。只有当这些判断标准从抽象理念转化为现实中的决策原则、评价机制和实施程序，支撑性部门才不至于继续围绕各自内部逻辑运行，而能够在统一的产业现代化目标下重新配置其资源和行动方向。

三是，把党的领导制度优势转化为现代产业治理优势，打破支撑性部门独立化运行的结构惯性，是有效治理的实质所在。现代产业体系难题的形成，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管理不到位”，而是金融、科技、数字等支撑性力量在其相对独立的运行通道中不断强化自身逻辑，进而对实体经济形成外在甚至反向约束。比如，金融可能更偏好流动性强、回报快的配置对象，科技资源可能被评价机制锁定在成果数量和形式认定之中，数字平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台也可能围绕用户规模和资本估值形成对现实生产过程的外部化关系。面对这种独立化倾向,治理应通过组织化、协同化和制度化安排,重构这些支撑性力量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结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17]。对现代产业体系建设而言,意味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由扩大信贷转向为制造业长期投资和关键技术攻关提供稳定资金供给,科技赋能由单纯增加投入和项目数量转向贯通基础研究、中试转化与规模应用,数字融合由“上云用数”转向深度嵌入生产流程、质量控制、供应链协同和产业组织优化。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在党的领导下推动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使科学理论在组织产业实践中转化为制度力量,又使产业实践在不断提出和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深化对产业协同规律的认识,由此形成推动现代产业体系持续调整、不断完善的内生机制。产业实践中不断出现新情况、新矛盾,又会进一步检验和深化对现代产业体系运行规律的认识。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产业体系难题的解答,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形成理论认识、完善政策安排、推进产业实践,并根据实践发展进一步丰富理论认识。

一是,把科技创新锚定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之中,在产业实践中不断深化对科技创新与现实生产关系内在联系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18]。这一重要论述切中了现代产业体系中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相互脱节的关键问题,也为正确认识科技创新的社会功能提供了根本遵循。如果科技资源主要围绕项目申报、平台建设、成果评定、论文和专利等环节循环,而不能有效进入工艺改进、设备升级、工程验证、生产组织和产品迭代过程,其对现代产业体系的支撑就可能停留于成果数量和形式指标层面,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能力。知识形态的成果只有进入具体产业过程,转化为技术、工艺、设备和组织能力,才能真正成为现代产业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实质上是在产业实践中不断深化对科技创新规律的认识。由此,评价科技创新的尺度便不能仅限于是否形成独立成果,还要考察其能否进入具体产业、能否解决关键技术和工程问题、能否沉淀为制造能力和组织能力。从“成果形成”到“产业能力形成”的转换,是现代产业体系条件下科技创新社会功能的充分实现。产业实践为检验科技理论和创新政策提供了现实场域,科技成果在工程化、产业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又会反过来提出新的科学问题和理论问题,推动科技认识不断深化。正是在这种由理论创新进入产业实践、又由产业实践提出新的理论需求的循环中,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才能形成真正良性互动。

二是,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重组金融、科技、数字等支撑力量,把关于不同产业功能定位的理论认识转化为协同配置机制。金融、科技、数字等要素虽都在发展,但其配置方向、运行周期和评价标准并不一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19]。这一要求的理论内涵,是以产业链关键能力的形成为依据,重新确定各种支撑性力量的功能定位和配置方向。只有以具体产业链的完善和产业能力提升为基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科技创新面向经济主战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等理论原则,才能转化为稳定有效的现实运行机制。

就金融而言,其功能不能仅以资本流动速度、资产收益水平和交易规模衡量,还应考察其能否围绕设备更新、基础设施建设和未来产业培育形成长期稳定资金供给。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具有投资规模大、回报周期长、技术风险高等特点,如果金融资源主要流向高流动性和短期收益领域,易造成金融规模扩张与产业能力不足的矛盾。就科技而言,其配置方向应当由产业链堵点、技术卡点和工程难点所牵引,使科学发现、技术突破、中试验证和规模化生产形成连续过程。科技供给不能停留在一般性成果积累和技术展示,而应增强对产业关键能力形成的穿透力。就数字而言,其作用不能主要表现为平台规模扩张、流量积聚和交易环节数字化,而应深入生产制造、质量控制、供应链管理、设备运维和市场反馈过程。只有当数据要素进入现实生产过程,改变生产组织方式和产业协同方式,数字技术才真正转化为现代产业体系的内生能力。因此,体系协同不是要求每一种要素孤立地变得更强,而是使各种要素在共同产业目标下形成方向一致、功能互补和时序衔接的支撑结构。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三是，在多重链条深度融合的实践中形成现代产业体系的持续再生产能力，推动理论认识、制度安排和产业实践不断循环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13]，并要求“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20]。这进一步表明，现代产业体系应被理解为一个能够持续形成能力、不断积累优势并保持连续运行的社会再生产过程。马克思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分析表明，社会生产是不同生产部门在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中相互联系、连续运行的总体过程。任何一个环节中断，都可能影响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实现。现代产业体系要求各个产业部门和支撑环节必须建立与连续再生产相适应的功能联系，否则即使各种要素分别增长，也难以形成持续的体系能力，甚至局部要素过度扩张可能加剧体系内部的不平衡，使现代产业体系在表面繁荣中积累新的矛盾。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多链深度融合，根本目的就在于把产业要素重新纳入社会再生产总体过程，使资金投入能够转化为技术创新和生产能力，使科技成果能够通过工程化和产业化形成现实产品，使人才培养能够适应产业发展的持续需要，使数据资源能够在生产、流通和市场反馈之间形成有效循环。通过这种融合，不同链条成为彼此提供条件、相互促进并共同发展的有机环节。更为重要的是，多链融合不是一次性完成的静态结构设计，而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完善的动态过程。产业技术变化会提出新的金融需求和人才需求，金融和人才供给变化又会影响创新活动和产业布局，产业发展中出现新问题进一步推动政策调整和理论创新。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产业体系难题的解答，体现为一个由科学理论指导产业实践、由产业实践检验和发展理论、再由新的理论认识推动体系完善的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过程。体系协同把理论与实践连接起来，使正确的理论认识能够转化为产业内部现实关系，又使产业体系运行中的经验和问题不断进入理论视野。由此形成现代产业体系在理论指导、制度组织和实践创新相互作用中持续形成、不断完善的内在发展机制。

三、中国式现代化解答现代产业体系难题的世界历史意义

现代产业体系难题是社会分工持续深化、产业部门日益独立和社会生产联系不断复杂化条件下，人类现代化普遍面临的重要问题。中国式现代化从社会再生产总体出发认识这一问题，通过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及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对现代产业体系难题作出系统解答。这一解答不仅具有推动中国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现实价值，而且通过深化规律认识、拓展制度路径、增强发展中国家产业能力，进而对世界历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揭示了现代产业体系难题的生成机理，深化了人类对产业部门由分化走向协同规律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21]。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表明，这些现象是社会分工深化后，产业部门相对独立运行与社会生产要求整体协调之间矛盾的不同表现。一是，这一解答进一步区分了产业部门发展与产业体系形成。社会分工发展使原本包含于直接生产过程中的融资、研发、信息处理等职能逐步专业化，并形成相对独立的产业部门。这种分化有利于提高专业效率，但产业门类增加、部门规模扩大和局部效率提升，并不意味着现代产业体系已经形成。产业体系之所以成为“体系”，在于这些部门能否围绕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形成稳定的功能联系。二是，这一解答揭示了局部合理性与整体合理性之间并不具有自然同一性。金融部门依据收益率、流动性和风险水平配置资本，科技部门依据知识创新和成果评价组织活动，数字平台依据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实现扩张，这些行为在各自领域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当各部门主要依据自身运行逻辑配置资源时，其局部效率并不必然转化为现代产业体系整体能力。金融规模扩大可能与制造业长期资金不足并存，科技成果增加可能与工程转化能力薄弱并存，数字产业快速增长可能与生产过程数字化程度不高并存。三是，这一解答将现代产业体系难题提升为社会化生产组织问题。现代产业体系虽然包含更多产业环节和支撑要素，但其基本要求仍然是资金、技术、人才、数据和生产能力之间形成连续稳定的内在联系。脱离总体联系的单个部门发展，不仅难以构成体系，还可能加剧社会再生产中结构失衡。由此，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产业体系难题的解答，使人们对产业体系的认识由“发展哪些产业”进一步深入到“不同产业如何形成体系”，由对产业规模和结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构的外部描述进一步深入到对产业部门功能联系的内在分析。这一理论推进,为人类认识现代产业体系难题提供了更加完整的分析框架。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了破解现代产业体系难题的制度机制,扩展了社会化生产条件下产业体系的协同建构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破除体制机制弊端,探索优化方法路径”[22]。对现代产业体系难题生成机理的认识,必然进一步促使人们思考如何解决这一难题。中国式现代化揭示了产业部门分散运行与产业体系整体协调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可以通过科学理论指导和有效制度组织加以解决。一是,中国式现代化从社会再生产总体出发,明确了不同产业部门功能定位。金融、科技、数字等支撑性产业具有自身发展规律,但其在现代产业体系中的功能,不能仅以自身规模、收益和增长速度衡量,还应考察其是否转化为实体经济和先进制造业的现实能力。金融必须形成对设备更新、技术改造和关键产业发展的长期稳定支持,科技创新必须进入具体产业和产业链并转化为工程能力,数字技术必须嵌入生产流程、质量控制和供应链组织。二是,中国式现代化以党的全面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统筹社会再生产,形成兼顾市场配置效率与长期产业能力建设的制度机制。市场机制能够传递分散信息、激发主体活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难以自动解决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重大基础设施和产业链安全等投入周期长、风险高、外部性强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党的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通过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重大工程,对现代产业体系的关键方向和薄弱环节进行前瞻性安排。同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产业主体依据需求变化和技术进步开展竞争创新。三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中不断完善体系协同机制。现代产业体系并非静态结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调整关系和积累能力的动态过程。从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再到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我国对现代产业体系内部关系的认识持续深化。理论认识转化为政策安排和协同机制,产业实践中出现的新矛盾又推动理论和政策进一步发展。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把党的领导、制度优势、市场机制和产业主体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扩展了社会化生产条件下协调产业部门关系、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制度路径。

再次,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表明,发展中国家能够自主破解现代产业体系难题,这为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推进现代化创造了新的现实可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不可剥夺的权利。”[23]现代产业体系难题能否得到解决,直接关系发展中国家能否将外部资源和局部产业优势转化为长期自主发展能力。许多发展中国家并非完全缺少现代产业部门,而是金融、科技、数字、人才和制造业之间未能形成稳定联系,没有转化为现代产业体系的整体能力。一是,这一解答揭示了参与国际分工不等于形成现代产业体系。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资源出口、吸收外资和承接加工制造进入世界市场,也可能在个别产业环节形成较强生产能力。但是,如果核心技术、关键设备、长期资本和主要市场高度依赖外部体系,本国经济即使实现一定增长,也难以持续完成技术更新和产业升级。外部资本可能集中于资源开发、房地产和短期交易,技术引进可能停留在设备使用和产品组装,数字产业也可能主要服务于消费和流通,而没有转化为本国先进制造业的内生能力。二是,这一解答表明,破解现代产业体系难题的关键在于形成自主再生产能力。当外部市场、资本和技术条件发生变化时,产业体系仍能维持基本运行,并通过内部调整实现能力更新。金融、科技、数字和人才等支撑力量能否稳定转化为这种能力,构成发展中国家掌握现代化主动权的重要物质基础。三是,中国式现代化证明后发国家可以通过体系建设实现由外部要素输入向内部能力积累的转变。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表明,发展中国家可以立足本国发展阶段和制度条件,主动组织产业关系,使外部资本、技术和市场成为增强内部生产能力的条件。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破解支撑性产业与实体经济脱节、局部产业增长与体系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逐步形成持续再生产和产业升级能力。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为更多国家自主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提供了新的实践参照与合作条件,推动世界历史向自主发展、平等交往和共同进步的方向演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不追求独善其身的现代化”,“愿本着合作共赢理念,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更好造福各国人民”[24]。现代产业体系能力的增强,使更多国家能够以相对独立生产能力和持续再生产能力参与世界经济。世界现代化进程也将由少数国家主导的单向扩张,逐步转向不同国家自主参与、平等互动和共同进步的历史过程。一是,破解现代产业体系难题能够增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自主性。当金融能够稳定支持实体经济,科技成果能够转化为工程和制造能力,数字技术能够深入生产过程时,一个国家就不再只能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参与世界市场,而可以依托完整产业配套、技术创新和工程组织能力,主动选择产业合作领域和发展方向。二是,更多国家形成自主现代产业体系,将改变国际产业合作的现实基础。国际经济关系能否趋向平等,不能只依靠原则宣示,还取决于不同国家是否具备相对自主的产业能力。如果一方掌握资本、技术和产业链关键环节,另一方只能提供资源和劳动力,双方之间就难以形成实质平等。随着更多发展中国家形成稳定的技术、制造和产业配套能力,国际产业合作才可能更多建立在能力互补、利益共享和共同发展基础之上。三是,现代产业体系自主性的扩展将改变更多国家参与世界历史的现实条件。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历史是在生产力发展、世界市场形成和各民族普遍交往不断扩大的基础上生成的现实过程。当更多发展中国家能够解决产业部门分散运行与体系整体协调之间的矛盾,世界现代化的主体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国际产业分工也将获得由单向依赖向能力互补、由低端锁定向自主发展、由少数国家主导向更多国家共同参与转变的现实条件。

结　语

现代产业体系难题并不是某一国家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偶然出现的局部失衡,而是世界历史进入现代大工业、资本全球扩张和社会分工高度深化阶段之后普遍生成的结构性矛盾。在不同历史阶段,这一难题具有不同表现。在当代,这一难题集中表现为金融、科技、数字等支撑性力量持续扩张,却未能形成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先进制造业长期能力积累的稳定支撑。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分析视野,本研究表明,现代产业体系难题并非金融空转、科技悬浮、数字脱嵌等表层现象简单叠加。从根本上看,这一难题反映了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难以使各产业部门自身增殖逻辑持续服从社会再生产总体要求的内在局限,因而具有鲜明的世界历史性质。

中国式现代化对这一难题的解答,不是对既有产业关系的局部修补,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从社会再生产总体联系中认识和处理产业关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并在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中不断健全产业体系协同机制,推动金融、科技、数字等支撑性力量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的长期能力积累。这一解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了人类对现代产业体系运行规律的认识,拓展了高度社会化生产条件下组织产业协同的制度路径,也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破解现代化世界性难题的独特优势和普遍意义。现代产业体系难题贯穿现代化进程,涉及生产力发展、产业组织变迁、生产关系调整和社会再生产总体运行,其生成逻辑与现实形态具有鲜明历史性和开放性。本文主要围绕这一难题的历史生成、理论根源及中国式现代化的解答作出初步分析,所展开的讨论仍然是阶段性的、有限度的。对这一难题生成逻辑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对中国式现代化解答路径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中的具体展开,仍有赖于学界立足实践发展持续推进和共同探讨。

参考文献:

[1]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在京举行[N].人民日报,2025-10-24(1).

[2]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3]亚当·斯密.国富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阿尔弗雷德·马歇尔.马歇尔文集:第2卷,经济学原理.上[M].朱志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7]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M].福民,等,译.王辅民,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8]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9]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求是,2016-05-01.

[10]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求是,2020-08-15.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2009.
[1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14]习近平.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N].人民日报,2023-05-06(1).
[15]习近平.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J].求是,2025-11-15(22).
[16]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24-12-13(1).
[17]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J]求是,2024-09-15(18).
[18]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J].求是,2024-5-31(11).
[19]习近平.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4-02-02(1).
[20]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J]求是,2025-10-31(21).
[21]习近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J].求是,2025-01-02(1).
[22]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N].人民日报,2023-03-16(2).
[23]习近平.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24-09-06(3).
[24]习近平.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J].求是,2025-10-15(20).

China's Modernization: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of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and Its Global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LIU Xingang, LI Qianyu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effective formation and coordinated operation of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represent a critical challenge that must be addressed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modernization. Mainstream Western economic theories typically explain industrial linkages through market actors, price signals, and equilibrium mechanisms, tending to view the separate development of sectors and their market exchanges as the fundamental mechanism for forming an industrial system. However, real-world dynamics show that sectoral development does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systemic coordination. In contemporary times, this challenge manifests particularly in the rapid expansion of supporting forces such as finance, technology, and digital industries, which have yet to provide stable, long-term support for the accumulation of capabilities in the real economy-especially advanced manufacturing. China's modernization, grounded in Marxism perspectives, principles, and methodology, has developed a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and approach to managing industrial relations. Upholding the Party's overall leadership and leveraging the advantag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it has established institutional capacity to coordinate comprehensiv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ith sustained capability building. Through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it has fostered an endogenous mechanism that continuously adjusts and improves the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This solution deepens humanity´s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s governing the transition from sectoral fragmentation to integrated coordination, broadens pathways for synergistic industrial system construction, creates new practical possibiliti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pursue independent modernization, and hold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advancing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global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Human modernization;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challenges; Chinese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郑红翠]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